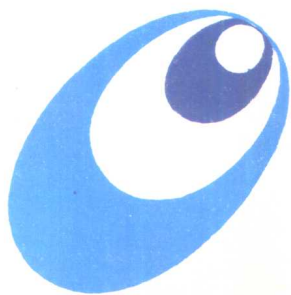


焦点问题论丛



渐进与激进

——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吴敬琏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 樊 纲 改革能否转向「激进」

● 李晓西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等于「渐进式」

● 张 宇 渐进式改革能否持续下去

● 杨瑞龙 增量改革引致存量改革的两种途径

● 孙来祥 对一种「社会共识」的

● 姜 洪 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利



成

焦点问题论丛

渐进与激进

——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吴敬琏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金梅 谢锐

责任校对：段健瑛

封面设计：卜建晨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贾志坚 刘军

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吴敬琏 等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6.25 印张 150000 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58-1033-2/F·764 定价：9.4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吴敬琏等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焦点问题论丛)

ISBN 7-5058-1033-2

I. 渐… I. 吴… 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
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7919 号

编者的话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举世瞩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各种矛盾、问题也不断出现。人们的视点聚焦于关系中国发展道路、国计民生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应选择哪条道路——渐进还是激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分权？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能养活自己吗？中国的轿车工业在道路拥挤、人口密集的条件下如何发展？国有企业能够摆脱债务困扰焕发“青春”吗？国内市场是需要保护还是开放？……这些热点论题引起了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冷静、客观、全面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极其艰辛而又意义深远的的事情；而真实地记录、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和思想轨迹，亦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愿注入一腔热忱，出版这套“焦点问题论丛”，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促进改革开放和思想进步。

“焦点问题论丛”收录社会各界人士对国内外普遍关注的若干热点问题所发表的见解，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的基础上，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实研究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力求把深奥的理论问题用深入浅出的写作方式，精练活泼的语言予以表达；努力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现代精品意识结合起来。我们企望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是一套思想新颖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焦点问题论丛”。

应该说明的是，本套丛书所涉及的观点并不表明我们是赞同或反对，收录国外学者的观点，也仅供读者了解某种观点的背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种观点都将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愿和广大作者、读者一道，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明天，为了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繁荣，付出全部智慧和力量，并希望通过“焦点问题论丛”唤起更多的人对“焦点问题”的关注。

1996年5月

前 言

80年代以来,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激进式改革道路与渐进式改革道路。激进式改革又称“休克疗法”,它是80年代末发生剧变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进行经济和政治转型时采取的基本方式。渐进式改革则是80年代后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渐形成的经济转型方式,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对于它们的优劣国内外学者中都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国外的经济学家以西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激进式改革优于渐进式改革,主张中国采用激进式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然而出乎人们的预料,渐进式改革使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成效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中国的改革创造了奇迹,对于渐进式改革的研究因此也成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世界性课题,成了转型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那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中

国改革成功的奥妙何在？渐进式改革真的优于激进式改革吗？中国的改革是否潜伏着深层的危机？对于渐进式改革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渐进式改革未来的走向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和其他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焦点。

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的未来。因此，对于中国的改革道路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编 者

1996年6月

冷静、客观、全面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极其艰辛又意义深远的事情，而真实地记录、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和思想轨迹，亦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愿注入一腔热忱，出版此套「焦点问题论丛」，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促进改革开放和思想进步。

《中国能养活自己吗》

《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建》

《轿车大论战》

ISBN 7-5058-1033-2



9 787505 810334 >

ISBN 7-5058-1033-2
F·764 定价：9.40元

目 录

吴敬琏

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 (1)

樊 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征与趋势…………… (11)

林毅夫 蔡 昉 李 周

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 (23)

李晓西

渐进与激进的结合：经济为主导的中国改革的道路
…………… (44)

张 宇

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否成功…………… (58)

杨瑞龙

渐进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 (75)

姜 洪

经济渐进改革的合理性…………… (98)

李建德	走势·问题·对策·····	(108)
张 军	中国改革的经济学释义·····	(130)
孙来祥	对一种“社会共识”的质疑·····	(142)
李 波	“激进改革”主张的思维误区·····	(152)
萨克斯 梅俊杰	休克疗法与中国经济改革——与萨克斯对话·····	(159)
杰拉德·亚当斯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169)
罗伯特·M·安格 崔之元	以俄国为镜看中国·····	(178)

用渐进论不能概括中国的改革实践，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才是我国以
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的根本战略。

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 战略吗^{*}

吴敬琏

对于中国的改革战略，国外的流行观点认为，其特点是实行“渐进主义”。“渐进改革”使中国改革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陷于困境，相反在 15 年改革期间实现了高速增长。这种观点在我国也有广泛的影响。90 年代初，有人就以此为论据，批判“激进改革论”，提倡所谓“新保守主义”。在力主改革的人们中，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好就好在不太快。

一、不能用“渐进论”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

“渐进改革论”是否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是否符合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 根据作者 1994 年 4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三期省部级主要干部研讨班上的发言稿编辑。文章题目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1. 改革前期的战略重点在“体制外”——非国有经济和农村。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的范围内，改革的确是渐进地进行的，15年来基本上只做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变革。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前，没有提出国有经济全面改革的问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实际动作也不大。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都没有采取实际步骤对国有经济进行全面改革。但是，中国改革举世公认的成就，并不是因为对国有经济采用了渐进改革的方法才取得的。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权力试点”。1979年1月扩大到100家。同年7月，国务院决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使得试点企业一下从四川省的十几个扩大到全国6000多个企业。这项改革的基本设计与1965年苏联柯西金的改革没有原则区别，仅仅是强化了对企业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物质刺激，并没有使它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所以到1980年，各方面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怀疑。薛暮桥提出，这种改革只是加强物质刺激的分配改革，作用有限，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建立商品经济。也有更多的人强调计划管理的重要性，认为应当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当时，后一种观点是占上风的。因此，从1981年开始，中国改革在国有经济领域中实际上停顿了。后来在国有经济中进行的改革，像承包制等，也只是一些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不变的条件下的改良。和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们在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把改革的主要精力放到了农村和对外开放方面。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允许在某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1980 年秋到 1982 年秋短短 2 年时间内，就实现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1982 年以后，乡镇企业大发展，进而带动了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加上搞了两个特区和沿海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一部分地区和国际市场对接，而且建立了一批“三资企业”。所以，从 1979—1984 年，中国改革的重点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城乡划分来看，重点在农村。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 1980 年以后中国改革的特点。1980—1984 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特点有关。

2. 实施“外围”战略既取得了成就，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采取外围战略，我们解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例如匈牙利从 1968 年开始改革，开始一二年情况还不错，到 1972 年、1973 年就遇到了困难，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出现。以后改革在国营部门中进进退退，一直没能找到出路。这些国家遇到的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是：改革的对象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而改革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又要靠它来支撑。这就好比一架机器，既要对它大拆大卸，同时又要用它代步，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因此到 80 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都陷入了困境。拖到 80 年代末期就完全崩溃了。

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新路。不是只钉住国有经济的改革不放，而是用一些改良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的运转，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经济方面去寻找新的生长点。这就是说，国有经济虽然是老牛破车，但并不急于大拆大卸，而是做一点小的改善，让它继续走着，同时在它之外再打造新车。这就使整个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撑点。15 年来平均发展速度为 9%，出口也年年增长。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但我们依靠迅速生长起来的非

国有经济的力量，较快地克服了种种不稳定因素。

但是这种战略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特别是“外围战”的长期延续会带来问题。经济体制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这部机器被分成两半：旧的部分仍在运转，而且占据领导地位；新的机器虽然部分建立，但不完整。这种状况不改变，新的经济体制不能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不可能提高。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我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都要求经济有比较快的发展。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入增加，二是效率提高。当新的经济体制未建立起来时，效率不可能有较大提高，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增加。而我国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数量很少，国民财富积累的底子又薄，没有多少闲置资源可以作为追加的投入，这就必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二年高速发展后就会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供投入，为增加生产所投放的货币没有着落，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扩大生产能力需要增加投资，工厂建成后需要流动资金，招收工人要开工资，都会多发票子。然而资源、商品不够，票子兑不了现，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尤其严重的是，我国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起飞阶段，经济结构变化很快，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要有先行的快速发展才能支撑起整个经济的起飞。但这些部门，恰恰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些领域的改革滞后和缺乏活力，势必给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瓶颈制约。速度一高到9—10%，卡脖子的瓶颈约束就会出现，也叫“过热”。前两年理论界一直争论我们的经济是已经“过热”还是“不过热”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讲，所谓“过热”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增长率数值标准，只是某个或者某几个部门不能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

经济发展速度达10%以上也没有出现过热，台湾在高速增长时期速度比日本还高，也没有出现过热，而我们却反复遇到这个问题。(2) 双重体制并存使腐败的滋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体制基础。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腐败最容易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即所谓原始市场经济时期。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权力对交易活动的干预，使权力可以带来财富，造成一部分超额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人利用这个公共权力谋利，容易产生腐败。二是市场不规范，规则不健全，有人就可以混水摸鱼，大发其财。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套体制并存的条件下，经济机制存在许多漏洞，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不规范，上述两个前提也将长期存在，成为腐败蔓延的广泛基础。(3) 新旧体制采取的政策不同，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沿海地区国有经济少，开放条件好；内陆地区重工业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有的企业已经放开经济，另一些企业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转；凡此种种，都使收入差别的扩大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积累能力差，就使我们很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使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受到影响。

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战略

如何对待改革面临的困境，是积极进取，还是继续拖延国有部门的改革？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改革是一种随机决策、“没有确定方向和目标的改革”。我认为这是对邓小平改革战略思想的莫大误解。他的确说过，在改革的过程中，应当“走一步看

一步”。^①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应当在改革的路线和目标充分明确的前提下谨慎从事，不断总结经验和修正错误。而不是说，改革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设想。事实上，邓小平并不满足于改革前期在“体制外”（非国有部门）取得的成就，当“体制外”改革为整个改革提供了支撑点，他就及时提出了实行改革战略重点的转移，把改革推向国有部门，“摸老虎屁股”^②的要求。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从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这一战略重点转移的开始。

1. 全面改革战略实施以来，进展不尽如人意。

1984—1992年期间，虽然中央作出了多次决定，进行以国有工商业为重点的全面综合改革，但体制内的改革进展仍旧不尽如人意，小平同志所说的“摸老虎屁股”的攻坚战略始终没有能够打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全面改革的变动剧烈，配套的要求又很高，因而难度比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多重的阻力存在：一是认识方面的阻力，例如，“姓资姓社”的争论一直与改革相伴随，每一步都要克服保守思想的反对。二是利益方面的障碍，改革每前进一步还会由于侵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反对。目前，与改革相抵触的既得利益有两类。一类是建立在旧体制基础上的既得利益，另一类是在双重体制并存既有行政权力的广泛干预，又有极不规范的市场存在的格局下形成的既得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前一种情况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阻力比较警惕，但对后一种情况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阻力认识不够。在中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乱才能大治”一类说法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代表后一种利益的人们在力主保持和扩大改革前期由于全面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1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